



意想不到的芦穄趣闻种种

□羌松延

又是一年秋来到。正是抖芦穄、剥芦穄、吃芦穄的时节,笔者于是也凑个热闹,来说说芦穄。

据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卷四“物产”,“芦穄,蜀黍也,五月熟为上时,七月熟为中时,八月熟为下时。”而1912年科学书局《栽培新编》收有词条“蜀黍”:“禾谷类中最高之植物也,我国北部栽植最多,南方亦多栽之。南人称为芦穄,北人称为高粱。”很明显,州志所记芦穄就是高粱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,上海新华书局发行的大型工具书《日用万事顾问》,在农业篇“种谷要诀”部分,将芦穄与稻、麦、芝麻等五种农作物同时收入其中。此处的芦穄,仍是指的高粱。

当然,我们今天所说的芦穄并非高粱,而是高粱的一个变种——甜高粱(也称糖高粱)。清光绪《海门厅图志》卷十“物产”:“今高粱别种曰芦穄,茎甘可食。”另有记载:“甜高粱为一年生禾本科植物,系禾本科高粱属粒用高粱的变种,原产于非洲,作为饲用及糖料作物被长期栽种,有‘北方甘蔗’之称……在长江下游地区普遍种植。”简要说明了芦穄的由来与分布等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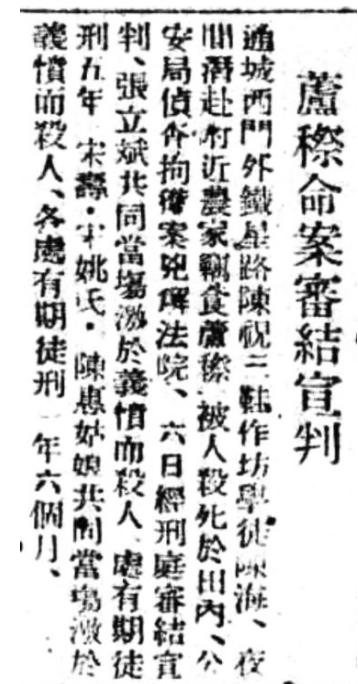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地方土特产,肉质松脆、汁多且甜的芦穄早已成为上海崇明及本省苏州、泰州等地农村的常见植物,在南通更是被家家户户广泛种植于田埂渠畔、十边隙地等处,每届夏秋,几乎随处可见。而与之伴随的,是一些地方历史记忆的碎片。

芦穄用途十分广泛,因其“茎秆富含糖分,营养价值高”,故可“产糖、糖浆,还可以做酒、酒精和味精,纤维还可以造纸”。为推动土地增效、农民增收,早年在乡的张謇曾提倡蚕桑,以惠及乡邻,即便是大魁天下之后的



上:1991年10月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(左一)在通考察。

下:1934年12月8日《申报》关于南通芦穄命案判决的报道。



光绪二十三年,张謇还在“试海门芦穄炼糖”,并记下详细数据与试制结果——“试芦穄煎糖:芦穄42两,榨汁9两5钱,渣26两(皮去6两5钱),收膏1两5钱。膏如厚饴糖。”

此外,张律、朱成的《龙游乡味》里曾写道,若“将芦穄、高粱等按一定比例酿造,能产出绵甜柔和、回味悠长的高粱美酒”。民国年间的南通“芦穄烧”曾小有名气。如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上,参展的酒品中就有来自南通普善号的芦穄酒。另有缪文煜1936年撰《耕茶之物产》,当地所产“芦穄烧”也被记入其中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备受人们欢迎的芦穄曾屡被禁售。究其原因,原来是“芦穄一物,中含水分甚富”,但因“渣皮狼藉街衢,颇不清洁,而蝇蚋(按:指苍蝇和蚊子)丛集,尤足妨碍公共卫生”,为此,当年的南通“警厅曾经示警当街售卖”。其实,早在三年之前的1924年,“石港四门,有小贩肩售芦穄,市民购食,甚形踊跃”。有访员因芦穄“皮渣星布满街,蝇蚋麇集,尤为疫之媒介”而投书《通海新报》,呼吁“芦穄宜禁”“亟宜取缔”。——如此看来,芦穄被禁,主要是糖分太高惹的祸。

虽是农家寻常之物,却有人因贪嘴而送了性命。1934年8月底,南通城西锦兴祥鞋帽店学徒陈海侯,夜间潜赴西门木行桥陈姓田内偷窃芦穄一根,“为田主所觉,加以凶殴,讵伤中要害,竟至毙命”,酿成一桩命案。

2018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“启东芦穄”(按:查阅民国南通报,均写作“芦穄”)。孙锦标《南通方言疏证》亦作“芦穄”,并注“此‘穄’字,通俗则读若‘基’”)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。有了品牌的加持,不仅拓宽了村民们的增收之路,还让更多人了解并品尝到芦穄的独特风味,让这份来自南通的甜蜜传得更远、更久。

能带上当季青翠的芦穄,常能一解在外打拼者的乡愁。1991年10月,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来通视察,曾向时任南通市委书记吴锦问起:“今年的甜芦穄还有吗?”尝过之后,又带了六根南通芦穄回北京。吴学谦生于上海,从小对芦穄(上海人称甜芦穄)很熟悉,此时又逢秋季,正是芦穄成熟时节,自然就想起了童年的味道。

南通人爱吃芦穄,于是将芦穄融入了日常用语中。例如以歇后语“芦穄苗儿拉二胡——白糊自”,来调侃那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。就连南通人打长牌娱乐时的“牌儿经”里,也有“芦穄做酒红茵茵,玉米做酒竹叶青。芦穄稽,西北人儿栽,簪帚把儿夹到沟东卖”等语句。

自古以来,崇启通海的芦穄比较甘甜,名头不小,也早就有了规模种植。如1924年10月曾有报道,海门老农倪绍青,当年“夏种芦穄千余步(按:一步田约合四亩),入秋以来,发芽滋长,刻已成熟,开园售卖,搭棚监守。除邻近购啖外,远乡批买者,接踵而至”。如今,启东、海门等地更有专业种植户把芦穄做成了产业,仅启东市的芦穄种植面积就有15000亩左右。其中,启东海复镇家禄村“嘴爱农场”的芦穄种植达160亩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,该场的芦穄口感甘甜脆爽,备受市场青睐,乡间土产,竟成“网红尖货”。

2018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“启东芦穄”(按:查阅民国南通报,均写作“芦穄”)。孙锦标《南通方言疏证》亦作“芦穄”,并注“此‘穄’字,通俗则读若‘基’”)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。有了品牌的加持,不仅拓宽了村民们的增收之路,还让更多人了解并品尝到芦穄的独特风味,让这份来自南通的甜蜜传得更远、更久。

骑岸镇赛马

□程太和

上海早有跑马场举行赛马活动,南通北乡骑岸镇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,也有了每年一度的骑马比赛,由此名声大噪。

为抵御海潮,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率民工在此地围筑海堤,始称“皇岸”,有岸可通骑,由此得名“骑岸”。

苏北本不产马,良驹多求于张家口之外。南通地区也不例外。当年南通北乡的赛马,大多由几个财主集中的大庄子轮流主办。骑岸集镇周边有多个好马的财主,由他们出面举办赛马之事也就正常不过了。为了便于民众观看,赛期大多选择在相对农闲的农历二月初二至二月半之间。

在赛马的数日前,就组织人员将村

前的大路修整平坦,用作跑道。这时四乡八镇的小商小贩就沿着大路搭起芦穄棚做生意。集镇周边哪怕是较穷的人家,也要接上几个亲友来看赛马。大户人家更是热闹非凡,至亲好友,先数日即举家来临,赛马过后还得住上几天。还有南通城里的达官公子、富太、小开也多有乘船到骑岸来看热闹的。

赛期一到,大清早跑道的两旁就挤满了人,那些活力充沛、身体敏捷的人早就爬到了路旁的大树上,把树干都压弯了。

比赛开始前,先是预热,即由本庄的二、三流马儿在跑道上跑几趟,以慰观众。

约莫八九点钟的辰光,爬在树上的

那些小伙子,首先发出惊人的怪叫,原来是他们看到别村的马儿来了。果然四面

八方都有尘土飞扬起来,渐渐地尘土中出现了人和马,由远而近,煞是壮观。那些名驹骏马按照各自的编号统一进场,在人们的欢呼声中,骑手按辔徐行,因为这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。此时,主持赛马的头儿、也就是本次赛马活动出钱最多的头儿,在众骑师的簇拥下策马前来,向众马友一一拱手为礼,俨然主人架势,颇显威风。

任凭观众如何喧闹,正式的赛马只得拖到晌午时分。与跑马场的赛马相比,乡下的赛马当然带着一个“土”字,没有秩序册、没有裁判员、更缺乏后勤保障。赛马场上没有固定的起跑线,也没有工作人员手持发令枪发出起跑信号,而是由一马先跑,接着其他马急起直追,

跑输了的便一去不返;获胜的则带着无比的自豪感沿原路回来,接受观众的欢呼后,回到广场休息。这时第二组又开赛了,之后再依次是第三组、第四组进场……最后才是总决赛。

当年骑岸一带,包括邻近的石港、十总以及如皋东乡曹埠(今属如东)地区蓄养马匹的大家多,参加比赛的马也多,故总决赛要到日落前后才能完毕。马儿跑胜了,不仅是主人的光彩,同村的观众也觉得很有面子。因此,往往马儿已入厩休息,而观众们的谈兴还正浓厚呢。

1937年后,全面抗日事起,乡村的名驹骏马也投身到抗战前线。从此,骑岸镇赛马这一延续了多年的传统活动不得不消失了。

海安“五坝”

□苏学勤

海安古城就有“五坝”的称呼。“五坝”即:上坝、中坝、下坝、草坝、徐坝,这个称呼,一直沿袭到现在,不少“老海安”仍不改口。

海安为什么要以“坝”字来命名这些地方呢?需要从海安的地理位置和遭遇的天灾说起。海安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,地势比南边几个县都低。就说近代明清以来,这一带水灾不断,海安人是吃尽了苦头。筑坝挡水,让汹涌的洪水朝地势更低的东台、兴化等地流去,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打坝,成本低,效率高,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路径,于是海安古城有了“五坝”,地名便于识别和管理,这也是海安人的智慧。

当年,“上坝”的范围被定为东起牙桥口,沿着通扬河一直到中坝口向西200米处,也就是蒋家巷巷口处,海安人称之为“上河边”,就是“上坝”。这里特

别要提到两处,一是“万民洞”,二是“中楹桥”,这两个地方如果决口,大水就会冲入繁华地区,其重要性非同一般。

“中坝”这个区域,几百年来一直是海安古城的商业中心,这里有商铺好几十家,还有许多官方机构,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而“中坝”不仅要防通扬河的大水淹城,还要防北大河大水“倒灌”。20世纪50年代初,海安发大水,我就看到中坝口向北几十米处,筑起一条一米多高的“土坎”,麻袋和草包里装的泥土,堆在旁边,严阵以待。

“下坝”是指当年中坝口北边下坝东河向西的区域。这里要顾及新华路上的几千住户。一旦水冲过来,将会影响到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的生活。

团结桥古称“杨家桥”,这里向西有一条小河,直通西寺庙和草坝口。这里有全县唯一的海光发电厂,还有粮库和

米厂,不能疏忽。当年的“草坝”区域,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,东西向的通扬河道,已有几百年的历史,是一条水上大通道。那时的“草坝”并无桥,向西拐两个弯就是三里闸。三里闸还没有改造时,发大水就开闸日夜放水往北流,也是一项排涝大举措。

1954年7月,海安发大水,时任县长景文光亲临一线指挥。当他看到有人离岗到被水淹没的路上捉鱼时,急得掏出盒子枪大吼:“如果离岗去捉鱼,我就不客气了。”景县长的吼声锁住了那些“捉鱼人”。

徐坝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。从如皋方向来的大水汹涌澎湃,必经此处。1954年发大水时,海安汽车站的客车因大水不能进站,乘客改由徐坝桥北上。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多辆大客车在这些地方转运旅客,井然有序。

当年的徐坝防水有南北两道防线,南边要防通扬河冲开缺口,进入东大街区域。北边要防“倒灌”的大水,冲向“万民洞”区域,因为万民洞地势低,一旦发生里外夹攻,大水就会冲入海安古城,万民洞地段防守是此处重点。

解放后,海安人民政府对水灾的防治非常重视,决定委派搬运工人担任守护“五坝”的重任,其他部门配合。当年的搬运工人有四五百人,专门组建了一支抗洪大军,实行集体食宿,联络方式是骑自行车传达通知。哪里出现险情,很快就会有抢险队伍到达。搬运工人的一支独轮小木车队伍起到了大作用。当年的工友们个个身强力壮,且组织纪律性强,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,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。

如今,海安“五坝”的称呼,已被人们淡忘。但当年它在保护海安人民生产生活方面起的作用,不应被忘记。

东皋三琴递藏摭谈

□子安

世事若白云苍狗,分合无定,历史上流散无踪的琴不知凡几。相比之下,云闲能得三床传于后世,且都在琴人手中,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
广陵故壤,东皋古邑,地得江海钟灵,宋元以降,琴人辈出。查阜西所编《历代琴人传》,录皋籍琴人达十三位之多。其中,成就最高的当属广陵派琴家云闲。云闲(1839—1912),名空尘,所著《枯木禅琴谱》为广陵派五大琴谱之一。杨荫浏为其作传:“上人名空尘,俗姓姜,如皋人,琴之外兼能书画。”他晚年曾回掘港重修祖坟并立碑,碑文:“光绪二十五年,姜氏之墓,后裔释云闲敬立。”

云闲启蒙于如皋菩提寺牧村,后遍访名师,最终定居苏州。朱敏文序云:“后人卓锡虎丘。”沈秉成序云:“云闲为余方外交,居虎丘。”故云闲身后,其琴多遗留苏州,递藏可考者尚有三床。

第一床为仲尼式“寒泉”,长122.5厘米,隐间112.5厘米,肩宽19.5厘米,尾宽12.8厘米。髹黑漆,间有朱砂。琴面以小蛇腹断,小流水断为主,局部有梅花断。长方池沼,龙池上方刻琴名“寒泉”。腹内墨书分别为龙池右侧“乾隆四年紫阳朱氏藏”,龙池左侧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”,凤沼右侧“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。顾韵泉,名沂,为云闲好友。他是如皋籍人(今属如东),擅古琴制作与修复,斫有落霞式“霜天铎”琴传世。

此琴是查阜西在上海购得,其著述中多次提到“云闲僧所修乾道四年紫阳朱氏琴”“云闲宋琴”“宋琴响泉”。可知此琴原拟名“响泉”,“寒泉”是后来才确定并篆于琴背的。

1945年,查阜西携“寒泉”赴美,回国时,将琴寄存在国会图书馆友人处。后张充和与傅汉思新婚不久,经沪赴美,查阜西让张充和到国会图书馆取回“寒泉”,作为新婚贺礼。从此,“寒泉”陪伴了张充和一生,直至2011年,西冷上拍此琴,才为他人所购。

另《会琴实纪》录有仲尼式“虎阜梵音”琴,腹内亦刻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,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。此琴也是云闲旧物,曾为琴家吴建宇(字兰荪,1883—1961)所得,惜抗战时被土匪掠去,自此杳无音讯。琴背题识:

此琴声音清越,以廉值得于吴市,知为云闲开土重修,故合法度。从来良材遇良工,亦复湮没不彰。因以“虎阜梵音”名之,不忘所自也。戊午天贶节湘西吴建宇。

第二床为仲尼式“一天秋”,长120.5厘米,隐间112.3厘米,肩宽19.8厘米,尾宽13.4厘米。面桐底梓,黑漆,底面呈细牛毛断。腰部微收,造型精秀。琴额原刻“一天秋”三字,因漆补已漫漶。腹内烙“朱致远制”四字。

古人常会为爱琴配以琴囊,不弹时将琴贮于其中可防尘,亦便于携带。欧阳修曾将苏轼所赠布料制成琴囊,并视若珍宝,《六一诗话》中记有:“苏子瞻学士,蜀人也,尝于消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布弓衣……余家旧蓄琴一张……遂以此布更为琴囊,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。”

“一天秋”的琴囊,有云闲所绘水墨画及题诗,可见其十分珍视此琴,也印证了他“琴之外兼能书画”。马塘琴家邓怀农曾于苏州购得此琴,后转给梅庵琴人刘嵩樵所得,至今仍藏刘家。

第三床是仲尼式“枯木吟”,长120.5厘米,隐间112.2厘米,肩宽17.9厘米,尾宽13.1厘米。面桐底梓,黑漆,鹿角灰胎,内杂孔雀石屑,牛毛断兼小流水断,局部有梅花断。琴尾方纹冠角与琴背一字眉式龈托颇有特色。龙池上方刻琴名“枯木吟”,与云闲自制曲之一同名。龙池下方“枯木禅”方印,与琴谱自序后钤印一致。“枯木吟”的原配琴囊在底部预设两孔,以便足露出。

云闲曾将此琴传给苏州弟子王元燦(字星如)。王元燦之子王鹤寿(字仲皋,1880—1952)十多岁时随父学琴,后亦受云闲指点,善《梅花》《平沙》等曲。王鹤寿有一儿二女,皆未传其琴艺。儿子和大女儿去世后,家藏古琴和琴谱一直由小女儿王梅话保管。王梅话终身未嫁,婚后,包括“枯木吟”在内的所有遗物,交由一位同事处理。同在苏州的裴金宝先生有缘成为托付之人,现琴底两足间“裴柏闻琴”方印,即为裴先生所刻。下图:从上至下依次为寒泉、一天秋及枯木吟正反面。



自行车曾受超严格管理

□朱今更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在启东海复棉厂工作(该厂前身是张謇先生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),星期天回吕四老家,皆以步代车长跑而至。成家后我夫妇二人节衣缩食攒了两年,于1966年9月购入一辆凤凰牌载重型自行车,价格145.80元,一直用到了1992年,中途只换过一次里外胎,可见质量之好。再后来买了轻便车,那部旧车因车架结实完好,送给了农村一位亲戚。当年购买自行车等全套发票仍保存完好,看上一眼便使人仿佛回到了58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购了自行车才知道对自行车管理的严格。从吕四至县城单程四十公里,中途至少有四个站点要查相关票据:一、新车看发票;二、查车龙头上钢印编号、铝牌上钢印编号的(包括敲钢印编号的交款发票)以及公安局发的自行车行车证的三个编号是否一致,若有差异则要扣车(上述均由县公安局办理);三,出示完税发票。

严查证件和骑车人,最大的好处是盗贼不敢偷车,即使偷到了